亲密伴侣暴力的成因：社会学习和女性主义理论下基于态度的解释

涂画　张春妹

（武汉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摘 要 个体对于亲密伴侣暴力的态度可以显著预测其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行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身上，也体现在第三方的干预意愿与反应上。通过引入态度变量，研究者得以将亲密伴侣暴力的成因问题转换为亲密伴侣暴力态度的成因问题，突破原有的研究局限。从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亲密伴侣暴力态度串联起两条解释路径：相关社会学习经历/父权制意识形态-亲密伴侣暴力态度-亲密伴侣暴力。未来研究应将这种两种理论的独特视角——社会学习理论重视的成因过程与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的缘起根源——结合起来，综合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从个体水平到群体水平，建立起多元交互的亲密伴侣暴力态度解释模型。

关键词 亲密伴侣暴力；态度；社会学习理论；女性主义理论

1 引言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一种常见的暴力形式，它是指曾经或现在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攻击或控制行为(Dixon & Graham-Kevan, 2011)，包括躯体攻击行为、精神虐待、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性胁迫，以及各种控制行为(Devries et al., 2013)。如今，亲密伴侣暴力已经被视为一项重大社会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从 154 个国家的 307 项研究采集的大样本数据，亲密伴侣暴力的终生流行率与年发生率分别为 26%和 1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而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T. Yang 等人(2019)回顾了 26 篇中国地区 IPV 流行率相关的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一般群体中的亲密伴侣暴力的身体暴力、心理暴力和性暴力终生发生率分别是 2.5-5.5%、17.4-24.5%和 0.3-1.7%。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研究者们就开始关注亲密伴侣暴力的成因问题。IPV 的解释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者为个体层面的理论(Individual theories)，关注个体独特的生理心理特征、家庭环境背景，如社会学习理论；一者为社会文化层面的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ies)，强调 IPV 产生的文化根源，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代表(Bell & Naugle, 2008)。尽管 IPV 的解释

通讯作者：张春妹，E-mail: zhangcm@whu.edu.cn

理论发展较早，但由于研究主体和研究伦理的限制，IPV 成因探讨主要停留在 IPV 行为的成因研究上，并且存在许多局限。一方面，由于 IPV 这一行为的主体限制，以往的 IPV 研究只能采用回溯性的方式，对已经出现 IPV 施暴或受害的个体进行研究，而无法以前瞻性的视角，关注那些尚未处于 IPV 关系的潜在施暴者或受害者，因而研究的价值会受到回溯性研究设计的限制，并且在预防 IPV 的发生上贡献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科学伦理的限制，以往研究难以采用实验性质的研究范式——操纵 IPV 的前因变量，以检验 IPV 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变化，因此过往研究以横断面的相关性研究为主，较少开展具有因果说服力的纵向追踪与实验研究，因此在因果方向上存疑。而将态度引入亲密伴侣暴力领域，有利于突破以往 IPV 研究的这些限制。

亲密伴侣暴力态度(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itudes/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A)的相关概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以不同形式被提及(e.g., Beliefs about wife beating; Saunders et al., 1987)，但直到本世纪初，这些纷繁复杂的名词才逐渐归纳为“亲密伴侣暴力态度”——如 Lipps(2002)使用 IPVA 这一概念逐渐取代原有的“纵容婚姻暴力的态度(attitudes condoning marital violence)”，将纵容(condoning)、赞同(approving)这些繁杂的具体概念归类为“态度”，并且把“态度”限定在亲密伴侣暴力这一对象上，推动 IPVA 相关研究在 IPV 领域占据一席之地。Gracia 等人(2020)通过对 62 篇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态度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出四种类型的 IPVA：1. IPV 的正当化(legitimation)，其中包括谴责受害者(victim blaming)、为 IPV 辩护(justification)等；2. IPV 的可接受度(acceptability)，包括对 IPV 的接受、容忍(tolerance)或认可(approval)等；3. 对 IPV 进行干预的态度，包括帮助受害者的意愿、向执法机关报告的态度等；4. 对 IPV 的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包括感知到 IPV 的严重性(severity)或严肃性(seriousness)等。总的来说，IPVA 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亲密关系之中的暴力是否接受的态度(Gracia, 2022)。

回到之前的问题——亲密伴侣暴力态度如何有利于研究者突破以往 IPV 研究的主体和伦理限制？这一方面得益于，态度的引入使 IPV 的成因问题逻辑前置为 IPVA 的成因探讨，将未涉入 IPV 事件但未来可能与其相关的、潜在的“施暴者”、“受害者”或“干预者”纳入研究，使 IPV 研究与更广泛的群体联系。例如，研究者不再仅是回溯 IPV 施暴者的生活经历对其 IPV 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探讨一般公众的生活经历对其 IPV 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IPVA 对潜在 IPV 施暴者的指向性可以帮助研究者以纵向追踪的方式，检验预测因素与 IPV 态度、IPV 行为的关系。此外，虽然由于伦理限制，IPV 无法直接作为实验研究的结果变量，但以仅停留在态度层面而并不带来实质伤害的 IPVA 为结果变量，可以检验预测因

素与 IPVA 的因果关系，从而间接验证预测因素对 IPV 行为的因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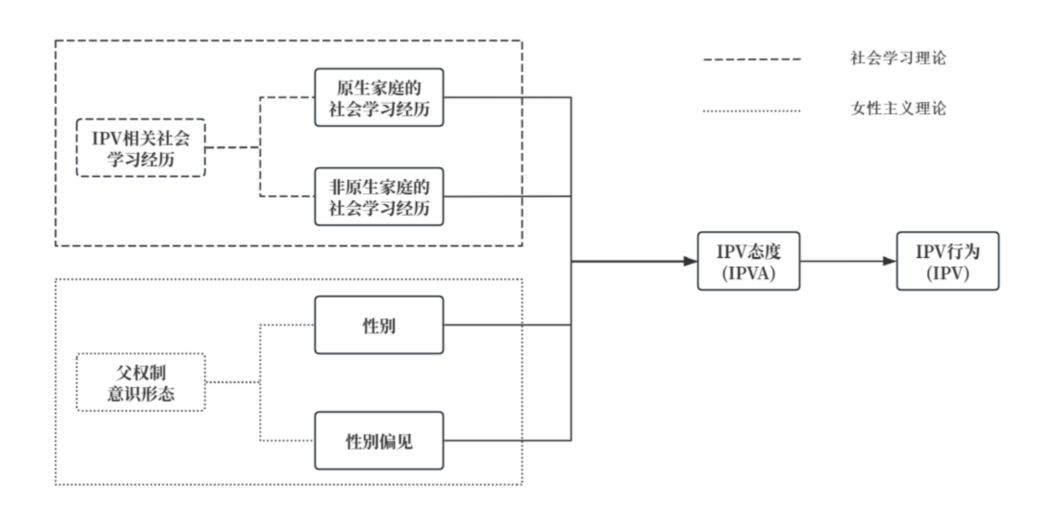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态度的亲密伴侣暴力成因模型

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从 IPV 态度入手，补充和完善了原有的 IPV 成因理论(Gracia, 2022)，但是当前对这部分研究仍缺乏系统性的综述。基于 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一致性预测作用，本文将从 IPV 成因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两个视角，分别探讨 IPV 相关社会学习经历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 IPV 态度(IPVA)和 IPV 行为的影响(见图 1)。 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介绍与讨论。

2 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影响

基于态度的亲密伴侣暴力成因模型建立在 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一致性预测作用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在理论层面，根据 Waltermaurer (2012)提出的 IPV 社会辩护模型(A Social Justification of IPV Model)，IPV 态度对 IPV 施暴者、受害者和除此以外的第三方的行为都产生影响。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 IPV 是合理的社会中（即 IPV 可接受度高的环境下），施暴者更有可能认为他/她有权利实施 IPV，从而导致 IPV 发生率的增加。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面对 IPV，受害者也更可能合理化他/她所受到的虐待，因此就不太可能向第三方报告或寻求第三方干预，对 IPV 的正当化态度会影响 IPV 受害者的行为选择。同样，如果第三方是在高 IPV 辩护水平的社会里目睹或听闻了 IPV 事件，他们表现出的干预意愿也会相应处于较低水平(Waltermaurer, 2012)。从理论的角度，对 IPV 的态度在整体上会影响 IPV 各类相关人群的相应行为。

在实践层面，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预测作用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体现在个体和群体两种水平上。在个体水平上，个体的 IPV 态度会阻止或促进 IPV 的发生。从 IPV 施暴者的角度来看，个体对 IPV 的可接受性与正当化等态度能显著预测 IPV 行为的发生

(Copp et al., 2019; Gracia, Rodriguez, & Lila, 2015)。具体来说，在青少年、成年人等一般群体中，IPV 的可接受态度与其报告的 IPV 经历成正相关(Cano-Gonzalez et al., 2022; Copp et al., 2019)；而通过与一般群体进行比较，我们也能发现 IPV 施暴者为 IPV 辩护的水平也会显著高于其他群体(Gracia, Rodriguez, & Lila, 2015; Martín-Fernández et al., 2022; Pöllänen et al., 2021)。鉴于相关性研究论证 IPV 态度与 IPV 行为之间作用方向性具有局限性，近年来一些纵向和干预研究也补充了 IPV 态度影响 IPV 行为的因果性证据(Mulla et al., 2019; Shakya et al., 2017)。例如，Shakya 等人(2017)对夫妻双方都进行三波纵向数据的收集，结果发现，男性从第 1 波到第 2 波时间点的 IPV 态度变化强烈预测了其妻子在第 3 波报告的 IPV 受害情况。具体而言，从第 1 波到第 2 波时间点，男性对 IPV 的接受态度每下降一个标准差，则预示着他的妻子在第 3 波中报告 IPV 的可能性下降 30%。

IPV 态度不仅会影响施暴者，还会影响 IPV 受害者和第三方的行为及意愿。对于受害者而言，消极的 IPV 态度会提升他们经历 IPV 的风险(Aboagye et al., 2021; Cinquegrana et al., 2022; Schuster & Tomaszewska, 2021; Sunmola et al., 2020)，以及停留在包含虐待的亲密关系的意愿(Alvarez et al., 2021)。例如，Aboagye 等人(2021)通过对撒哈拉以南的 23 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与拒绝 IPV 的女性相比，对 IPV 持支持态度的女性更有可能经历 IPV（crude OR = 1.72，95% CI = 1.64，1.79）。Schuster 和 Tomaszewska(2021)也发现，在童年期遭受性虐待的男性更有可能发展出对 IPV 的支持态度，进而增加了他们成年后的 IPV 受害风险。同样，对于 IPV 的第三方而言，IPV 态度与他们干预对 IPV 事件的意愿也密切有关(Badenes et al., 2023; Franklin et al., 2019)。例如，Badenes 等人(2023)对未来的卫生从业人员(即医学、护理学、心理学专业学生)调查后发现，更高程度的 IPV 接受和更低水平的 IPV 感知严重性、更低程度的干预意愿有关。

在社会水平上，IPV 态度也与 IPV 行为的普遍流行率有关。这表现为在整体上 IPV 负面态度的性别不平等环境下，IPV 的发生率更高(Powell & Webster, 2018; Tran et al., 2016; Tiruye et al., 2020; Wang, 2019; Willie & Kershaw, 2019; Zapata-Calvente et al., 2019)。例如，研究者们发现，在整体上性别不平等指数[1]高或 IPV 辩护率高的国家或地区，任何形式的 IPV 的流行率也会更高($r = 0.28$，$p< .05$; Willie & Kershaw, 2019)。Mulla 等人(2019)通过横断面、

---

[1] 性别不平等指数(The Gender Inequality Index)是指由联合国开发的一项国家水平上性别不平等程度的综合评估指标，主要由健康、赋权(empowerment)、劳动力市场参与 3 个维度组成，具体测量了孕产妇死亡率、15~19 岁未成年女性生育率、议会席位占比、25 岁及以上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劳动力参与率 5 个指标。性别不平等指数越高代表性别不平等程度越深。

纵向和实验研究的多重证据检验了这一影响的作用路径。结果发现，个体感知到的 IPV 流行率会影响个体感知到的同伴对 IPV 的接受态度，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自身的 IPV 态度，以及个体实施 IPV 的行为的倾向，进一步加剧 IPV 的流行。

鉴于理论与实践研究都验证了 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显著预测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从 IPVA 入手来探讨 IPV 的成因问题。IPVA 作为一项近端(proximal)因素，通过对 IPVA 成因的探讨，研究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分析 IPV 的影响因素。IPVA 的成因探讨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习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我们通过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梳理出“社会学习经历”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两条影响路径。

3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 IPVA 的影响因素

3.1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从 IPV 到 IPVA

社会学习理论一直以来都是 IPV 领域的主流解释理论，它的主要主张是：在原生家庭中目睹或经历暴力的个体可能会将暴力的行为脚本(behavioral scripts)内化，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家庭问题的有效方式，在之后的亲密关系中重复(Bandura, 1973; Schuster & Tomaszewska, 2021)。许多研究已经从实证层面支持了这一假定：即童年期目睹或经历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的个体在成年后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包括对亲密伴侣实施暴力(Antle et al., 2020; Clare et al., 2021; Eriksson & Mazerolle, 2015; Han & Choi, 2021; Hardesty & Ogolsky, 2020; Li, Zhao, & Yu, 2020; Semahegn et al., 2019)。例如，Clare 等人(2021)对 87 篇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后发现，IPV 的危险因素就包括在家庭暴力中长大和童年期目睹暴力。Li, Zhao 和 Yu(2020)的元分析结果也提示：三种类型的儿童虐待(儿童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和性虐待)都与 IPV 犯罪呈正相关($r = 0.17, p < 0.001; r = 0.13, p < 0.001; r = 0.13, p < 0.001$)。

但以往仅关注 IPV 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不得不回应的两个问题是：1. 为什么并非所有童年期目睹或经历过虐待的个体都会成为亲密伴侣暴力的施暴者？2. 为什么并非所有 IPV 的施暴者都有暴露于家庭暴力的经历(Mihalic & Elliott, 1997)？事实上，已有研究展示出童年期家庭暴力经历与实施 IPV 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在不同研究中表现出不一致的相关性。例如，Stith 等人(2000)对 39 项亲密伴侣暴力代际循环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童年时目睹或经历过家庭暴力与成年后卷入亲密伴侣暴力婚姻关系的相关性在 0.08~0.35 之间波动。这意味着，不同个体受到家庭暴力经历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并且在原生家庭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 IPV 的发生。

而将态度引入 IPV 领域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在客观的家庭环境经历和个体

的行为结果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遭遇了同样的家庭暴力经历后，个体可能产生不同的 IPV 态度——部分个体在目睹父母间暴力后形成了支持和容忍 IPV 的态度，因而在之后亲密关系中重复了 IPV 的行为模式，而另一部分个体在目睹父母间暴力后恰恰相反，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良后果并形成了反对 IPV 的态度，因而在亲密关系中不会实施或容忍 IPV 行为。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原生家庭的暴力经历，一些原生家庭以外的社会学习经历也可能导致个体产生消极的 IPV 态度，进而发展出 IPV 行为。

因此，研究者们引入 IPVA 作为 IPV 社会学习经历与 IPV 实施(/受害)的中介因素，开始关注影响 IPVA 的前因变量(Aboagye et al., 2021; Copp et al., 2019; Eriksson & Mazerolle, 2015; Schuster et al., 2021; Schuster & Tomaszewska, 2021)。IPV 社会学习经历包含原生家庭中的暴力和原生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经历。

3.2 原生家庭的社会学习经历对 IPVA 的影响

研究者首先关注到原生家庭中的社会学习经历通过 IPV 态度对 IPV 行为的影响，其中既包括童年期遭受虐待、强制型教养(coercive parenting)的直接经历，也包括了目睹父母间暴力的间接经历(Cano-Gonzalez et al., 2022; Copp et al., 2019; Priestley & Lee, 2021; Schuster & Tomaszewska, 2021)。从直接经历的角度看，Copp 等人(2019)将童年期经历强制型教养作为暴露因素，通过比较现在存在 IPV 经历的个体(含 IPV 实施与受害)中暴露于过往家庭暴力组与未暴露组的比值，与无 IPV 经历的个体中暴露组与未暴露组比值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2]，结果显示，现在存在 IPV 经历的个体暴露于父母间暴力与非暴露组的比例，是不存在 IPV 经历个体的暴露比例的 1.71 倍，说明原生家庭中的社会学习经历的确是经历 IPV 的风险因素。而进一步分析 IPV 态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时发现，一方面，负面的 IPV 态度可以作为危险因素预测 IPV 经历(OR = 2.26)的同时，童年期经历的强制型教养也能显著预测更消极的 IPV 态度(Copp et al., 2019)，说明 IPV 态度的确可以作为原生家庭社会学习经历与 IPV 行为之间的中介因素。

同样，目睹父母间的暴力的间接经历也能通过显著预测个体对 IPV 的消极态度，来影

---

[2] 比值比(Odds Ratio: OR)，常用于医学统计的对照病例研究，通过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中暴露因素的比例，建立起疾病与暴露因素之间的关系。OR 的计算公式是[OR＝（病例组暴露人数 / 病例组非暴露人数）/（对照组暴露人数/对照组非暴露人数）]。OR 值大于 1，代表该暴露因素为危险性因素，可能增加疾病的风险（在此为成年后经历 IPV 的风险），OR 值小于 1，代表该暴露因素为保护性因素，可能减少疾病的风险。

响个体成年后的 IPV 经历，并且这种影响还广泛作用于不同类型的 IPV(Cano-Gonzalez et al., 2022; Copp et al., 2019; Priestley & Lee, 2021)。例如，Cano-Gonzalez 等人(2022)发现，在童年时期目睹过父母暴力的个体更可能为 IPV 辩护，并且也相应地施行更多的网络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a cyberspaces, cyber IPV)，即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心理攻击(psychological aggression)、性攻击(sexual aggression)和网络跟踪(cyberstalking)。另一项 Speizer(2010)的研究同样也支持这一点，并且这项研究还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对男性被试而言，目睹过父亲殴打母亲的个体对殴打妻子持支持态度的可能性是没有这项经历的男性的两倍，相应的，这类男性在实践中发起 IPV 行为的几率也更高；而对于女性被试而言，目睹过父亲殴打母亲的个体也会对 IPV 持更支持的态度，但女性成为 IPV 施暴者的可能性没有增加，反而更有可能成为 IPV 的受害者。这一点在之前的研究也有印证：赞成殴打妻子的女性比不赞成殴打妻子的女性有更高的 IPV 受害风险(Kishor & Johnson, 2004)。

3.3 非原生家庭的社会学习经历对 IPVA 的影响

除了原生家庭的经历之外，社会学习理论的支持者还探讨了个体原生家庭以外的亲密关系经历、社会交往经历对 IPVA 的影响(Copp et al., 2019; VivesCases et al., 2021)。关于亲密关系经历的影响，Copp 等人(2019)发现，个体过往亲密关系中伴侣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ity)、言语虐待(verbal abuse)与控制行为(controlling behaviour)与 IPV 的支持态度呈正相关。此外，如果被试在过去一年有过实施 IPV 的经历(Machado, Gonçalves, & Matos, 2007; Shorey et al., 2019)，或者如果他们目前没有处于亲密关系中(Machado et al., 2010)，他们也会更努力地证明 IPV 是正当的。

个体感知到的同伴对 IPV 等暴力的支持态度，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经历也会影响个体自身的 IPV 态度和 IPV 行为(Berkowitz et al., 2022; Mulla wt al., 2019; Shakya et al., 2022; VivesCases et al., 2021)。例如，Berkowitz 等人(2022)回顾 25 篇暴力态度社会规范相关的文献后发现，那些高估了同伴支持其暴力态度(和行为)的个体更有可能施暴，而低估了同伴支持其干预行为的旁观者则不太可能进行干预。同样的结果在亲密伴侣暴力的情境下也适用。Mulla 等人(2019)发现，个体感知到的同伴对 IPV 的接受态度能正向预测个体自身的 IPV 接受态度，以及相对应的 IPV 行为，并且以纵向研究的形式验证了这一因果的方向性。除了个体感知到的 IPV 社会规范，一些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 IPVA，研究者发现，个体甚至仅是认识 IPV 施暴者（而不认识受暴者），其接受 IPV 的程度就会更高(VivesCases et al., 2021)。

虽然引入 IPVA 回应了原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问题，但这一视角依旧存在理论盲点。例如，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学习经历和 IPVA 在男性身上表现为 IPV 的施暴经历，而在女性身上却表现为 IPV 的受害经历？尤其是，我们进一步会追问，被学习者的榜样行为的来源又是什么？即为什么原生家庭与宏观社会环境中都会存在形成消极的 IPVA 的“沃土”，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家试图回答的问题。

4 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 IPVA 的影响因素

4.1 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从 IPV 到 IPVA

除了社会学习理论以外，女性主义理论是 IPV 领域的另一项主流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家看待 IPV 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问题本质上是一项性别平等问题，如果不把性别作为 IPV 分析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无法充分理解亲密伴侣暴力的本质(DeKeseredy & Dragiewicz, 2007)。Dobash 和 Dobash(1979)早在《针对妻子的暴力：反对父权制的案例》(Violence against Wives: A Case against The Patriarchy)一书中就阐明了女性主义对亲密伴侣暴力的看法：亲密伴侣暴力是父权制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而 IPV 本质上是男性支配与控制女性的手段。

女性主义理论的立足点在于亲密伴侣暴力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即 IPV 事件中，男性对女性暴力的占比与女性对男性暴力的占比的不对称性，而男性施暴者的模式占据了 IPV 报告的主要部分，这一点已经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Fanslow et al., 2023; Rajah & Osborn, 2022; Yakubovich et al., 2019)。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试图论证父权制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是 IPV 存在的根源。例如，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 IPV 的发生率更高(Willie & Kershaw, 2019)。但原有的 IPV 成因研究没有回答清楚的是：宏观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层面的 IPV 发生？IPVA 的引入回答了这一点。女性主义者通过 IPVA 建立起父权制意识形态与 IPV 行为的关联，论证 IPV 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首先，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对IPV的宽容态度和IPV实施之间存在联系(Gracia, Rodriguez, & Lila, 2015; Johnson & Sigler, 2018; Martín-Fernández et al., 2018)，进一步地，女性主义者试图论证父权制意识形态(如性别偏见)与 IPV 态度的关联(Grembi et al., 2024; Rodriguez Martinez & Khalil, 2017; M. Yang et al., 2021; Yoshihama et al., 2020; 杨淳惠 等, 2021)。通过将这两者结合，女性主义者说明了持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男性更有可能对 IPV 持宽容态度，进而更有可能实施 IPV 行为(Goessmann et al., 2019; Juarros Basterretxea et al., 2019; Sikweyiya et al., 2020)。具体来说，为了确立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与 IPVA 的关联，女性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以“性别”和“性别偏

见”两个关键变量为切入点。

4.2 性别对 IPVA 的影响

回顾父权制意识形态与 IPVA 的关联，首先需要了解“性别”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它的作用似乎在不同地区表现为迥乎不同的效价(valence; Gracia et al., 2020; Waltermaurer, 2012; Uthman et al., 2009; see also Begum et al., 2023; Ross et al., 2022)。Gracia 等人(2020)对 62 篇 IPV 态度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与元分析后发现，在所有研究中，女性(vs.男性)都报告更少地接受和正当化 IPV（包含更少地责备受害者)，并且她们报告的 IPV 严重性和干预意愿都比男性更高。但相反，Waltermaurer(2012)对 23 篇有关为 IPV 辩护(IPV justification)的量化研究进行回顾后却发现，在大部分地区，女性(vs.男性)为 IPV 辩护的水平更高，为 IPV 辩护的几率可以达到三分之二乃至更高。特别是一些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例如，Uthman 等人(2009)对 17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被试的 IPVA 进行回顾，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国家，女性相比于男性，更有可能为针对女性的 IPV（即女性为受害者）辩护，不同国家女性辩护的比例为 28%-74%，男性为 8%-62%；Rani 等人(2004)也发现，在一些非洲国家，女性(36%-89%)比男性(25%-75%)更有可能为殴打妻子的行为辩护，而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环境压制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推动了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浪漫化(romanticisation)与流行化，其中就包含了温顺地接受丈夫实施的“暴政”。这提示我们，不同地区女性(vs.男性)报告的 IPVA 态度存在差异，其背后根源可能在于个体内化的性别偏见的差异。

另一项同时探讨国家与性别差异的 IPVA 研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性别在不同国家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这种性别的作用可以被还原为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问题。Tran 等人(2016)借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第四轮多指标集类调查(Round Four of the UNICEF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s: MICS)，对 39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被试进行了 IPVA 分析，结果发现：总的来说，有关 IPV 的态度在不同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接受 IPV 的态度比例从阿根廷的 2.0%到阿富汗的 90.2%。但整体上，中欧和东欧国家接受 IPV 的态度比较少见，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接受 IPV 的态度则比较流行。而在整体上更不接受 IPV 的中欧和东欧的国家，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可能为 IPV 辩护(男性相对于女性的接受 IPV 的 OR: 1.08~3.5，均大于 1，说明男性接受 IPV 的风险性更大)；而在整体上更接受 IPV 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少可能为 IPV 辩护(OR: 0.47~0.79，均小于 1，说明男性接受 IPV 的风险性更小)。在此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性别在不同地区中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可以总结为：男性的 IPVA 表现出与整体的 IPVA 不一致的倾

向，在整体上不接受 IPV 的国家，男性表现出比女性更显著地接受 IPV 的态度，而在整体上接受 IPV 的国家却比女性更不接受 IPV；而对于女性来说则恰恰相反，她们表现出与整体一致且更“极端化”的倾向，她们在不接受 IPV 的国家为 IPV 辩护的水平更低，在普遍认可 IPV 的国家则更加接受针对女性的 IPV。性别在这些不同国家的 IPVA 上表现出的差异，可能实际上是因为个体受到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社会规范影响的差异。由于社会规训的影响，女性(vs.男性)更容易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表现出与社会群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本身可能也受到性别角色的影响；参见 Eagly & Chrvala, 1986)，因此在整体上接受 IPV 的国家，女性受到的含性别偏见的社会规范影响更大，因而比男性更能接受 IPV(Alvarez et al, 2021)；而在整体上不接受 IPV 的国家中，女性受到(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的影响更大，因此相较于男性，更不接受 IPV(Bhanot & Senn, 2007; Rodriguez Martinez & Khalil, 2017; Yoshihama et al., 2014)。

4.3 性别偏见对 IPVA 的影响

尽管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诸多流派，但女性主义者一般认为，父权制社会结构通过父权制意识形态来维持性别不平等的现状，而在 IPV 领域中，这种父权制意识形态最为典型的代表即是针对女性的性别偏见(Canto et al., 2020; Garcia, 2020; Lelaurain et al., 2021)。性别偏见(sexism)是基于性别差异的先入为主的不公正态度(张珊珊, 谢晋宇 & 吴敏, 2019)，它作为 IPVA 研究中最常见的社会心理变量和父权制意识形态变量，在对 IPVA 的预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Gracia et al., 2020)。根据 Glick & Fiske(2018)的分析，性别偏见也被称为矛盾性别偏见(ambivalent sexism)，它包含敌意性别偏见(hostile sexism, HS)和善意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 BS)两类。前者以消极或敌意的形式批评和惩罚违反性别角色的女性，而后者以“积极”和“善意”的形式引导女性遵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应在 IPVA 的研究中，这两种性别偏见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首先，总的来说，作为整体的矛盾性别偏见显著预测了对亲密伴侣暴力的不利态度(Cinquegrana et al., 2022; Gracia et al., 2020; Kruahiran et al., 2022; Lelaurain et al., 2021)。据 Gracia 等人(2020)的元分析，矛盾性别偏见与不同类型的 IPVA 都有关，具体来说，矛盾性别偏见得分越高的被试在 IPV 正当化和可接受度上得分越高，而在感知严重性和干预态度上得分越低。Cinquegrana 等人(2022)也发现，持有矛盾性别偏见的女性更有可能支持 IPV、将 IPV 迷思(myth)合法化以及对心理攻击持接受态度，进而也表现出更大地收到心理虐待的风险。

其次，鉴于 Glick & Fiske(2018)区分出敌意性别偏见与善意性别偏见的异质性，许多研

究者也尝试区分这两者对 IPVA 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研究者普遍发现，传统的、公然的对女性的敌意态度往往与支持 IPV 的态度更加密切(Herzog, 2007; Juarros Basterretxea et al., 2019; Koepke et al., 2014; Li, Sun & Button, 2020; Serrano-Montilla et al., 2020; M. Yang et al., 2021)。例如，Herzog(2007)将传统的性别偏见与善意性别偏见区分，结果发现传统性别偏见者相比于善意性别偏见者，对 IPV 的感知严重性得分更低，也更不愿意对男性施暴者实施严厉惩罚。为了进一步验证敌意性别偏见与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影响的差异，Koepke 等人(2014)对敌意性别偏见(HS)与善意性别偏见(BS)的规范反馈进行了操纵，结果发现，那些被告知他们的同龄人更接受 HS 而不是 BS(i.e.高 HS 低 BS 组)的被试，比那些更接受 BS 而不是 HS 组(i.e.高 BS 低 HS 组)的被试更认可 IPV 施暴者的行为，也更多地责备受害者，敌意性别偏见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性。

此外，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影响的效价(valence)还存在一定争议。在一些研究中，善意性别偏见与敌意性别偏见一样，都是作为危险因素，预测了对 IPV 的认可(Valor-Segura et al., 2014)，但在另一些研究中，善意性别偏见却表现出迥乎于敌意性别偏见的保护作用。例如 Herzog(2007)发现，在善意性别偏见上得分较高的被试，甚至会比（性别）平等主义的被试给予更高的 IPV 严重性评分，以及主张对施暴者更严厉的惩罚。那么，善意性别偏见对于 IPV 态度和行为而言究竟是一种保护因素还是危险因素？我们需要先回顾善意性别偏见的内涵。

善意性别偏见是一种主观上出于保护性目的，但是在客观上又会限制女性的特定角色的性别偏见(陈志霞 & 陈剑峰, 2007)。一方面，它在主观上表现为对女性积极、保护的态度，倾向于把女性视为需要保护和照顾的“柔弱”的形象，这似乎与 IPV 中直白的“暴力”手段相悖，因此可能成为负向预测 IPVA 的社会心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善意性别偏见本质上仍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它通过积极的评价引导女性符合“柔弱、被动”的刻板印象，巩固性别不平等的现状，隐含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与压迫(Glick & Fiske, 2001)，因此它也可能作为 IPVA 的正向预测因素。这种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预测的效价上的矛盾实际上是其概念中所包含的对女性的态度的矛盾，因此它的效价具有模糊性，可能会依赖于个体感知到的积极成分或消极成分而表现为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是需要后续研究深入探讨的问题。

5 IPVA 成因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5.1 IPVA 成因理论的独特贡献和相互联系

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亲密伴侣暴力的主要解释，在 IPVA 引入后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贡献。社会学习理论立足于行为习得过程，强调社会学习经历的榜样作用，而增加了态度这一个体认知变量作为中介因素，可以解释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个体行为影响的差异；而女性主义理论立足于 IPV 中的性别不对称性现象，从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 IPV 的本质，IPVA 的引入帮助女性主义者更清晰地构建出具有根源性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 IPV 的具体路径。两种 IPV 理论中，前者更强调 IPV 形成的过程，而后者则更关注 IPV 形成的根源，将态度纳入 IPV 领域后，两者在整体环境-个体行为中加入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知中介，构建出“IPV 相关社会学习经历-IPV 态度-IPV 行为”和“父权制意识形态-IPV 态度-IPV 行为”两条因果路径，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原有理论的解释力，在回答 IPV 成因问题的同时，也为未来发展出解释力更强的综合理论留下空间，并且有望被应用于 IPV 预防与干预的实践之中。

IPVA 的引入帮助我们发现两种理论构架中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社会学习理论视域下，IPVA 也表现出性别不对称性，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合作保留空间。虽然现有研究已经验证了社会学习理论对 IPVA 的假设，即 IPVA 起源于早期的社会学习经历，并由此转化为个体实际的 IPV 经历（包括 IPV 施暴与受害），但社会学习理论没有给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同样的 IPV 社会学习经历在男性身上表现为更高的施暴风险，在女性身上却体现为更高的 IPV 受害风险(e.g. Kishor & Johnson, 2004; Speizer, 2010)。这是否意味着个体在学习这些 IPV 相关社会学习经历时，不仅学习到将暴力作为亲密伴侣之间的交往形式，而且进一步地培养了接受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态度？即，在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下，性别与性别偏见也在 IPV 态度和 IPV 行为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中关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同样也可能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习得。例如 B. Phillips & D. A. Phillips (2010)在一篇质性研究中发现，儿童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常常内化性别刻板印象来作为他们行为的解释。例如，男孩经常会拒绝讨论目睹到的父亲殴打母亲的经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他们显得很 “软弱”，而他们是男子汉，这样性别偏见的内化可能导致新一轮的 IPV 消极态度和 IPV 行为的代际循环。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在理论框架上的非矛盾与在经验研究中表现出的内在联系，为这两者的融贯发展保留了充分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借助 IPVA 构建一个更综合性的理论模型，同时包含社会学习的习得过程与女性主义的根源探索，更有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 IPVA 和 IPV 的成因机制。例如，参考 Benson 等人(2006)建立的发展资源理论(developmental assets theory)的建构方式，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访谈、调查、实验等大量实证研究证据，从个体自身、家庭内部和广泛的社会生态学（如社区、国家）维度，将 IPVA 与 IPV 的预测因素进行归纳，根据功能效价与成因来源划分为保护因素/危险因素与内部因

素/外部因素，讨论这些因素分别对于 IPVA 与 IPV 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动态交互的复杂系统。

5.2 IPVA 成因理论的共同局限

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为理解 IPVA 和 IPV 的成因提供了独特视角，但它们也拥有一些共同局限。从它们共同关注的预测因素上看，这两项理论都只关注了 IPVA 的危险因素，而忽略了个体、家庭、群体维度上的积极因素，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同样的社会学习经历/性别偏见会导向不同的 IPV 行为与态度的矛盾现象。对于社会学习理论来说，态度的引入似乎的确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下，不同个体 IPV 遗传率之间的差异——因为他们由此形成的 IPVA 的不同。但仅停留在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仍需要回答："为什么同样拥有 IPV 社会学习经历，有些个体的 IPVA 会更加积极？"而对于女性主义理论来说， IPVA 作为中介因素虽然勾连起"父权制意识形态"和"IPV 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对于 IPVA 的预测作用却并不稳定，即并非所有持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个体就会为 IPV 辩护，这一点从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影响的效价二重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遗留的问题都说明了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在 IPVA 与 IPV 的解释力上仍有局限。

此外，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的 IPVA 和 IPV 研究也存在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局限。在前文中提到，IPVA 的引入帮助我们突破传统 IPV 研究中的群体限制与伦理限制，采用更多元的方法探讨 IPV 成因机制，现有的 IPVA 研究者已经践行了前者——即突破研究群体上的限制，将 IPV 的研究对象从以往的 IPV 施暴者、受害者扩展到 IPV 事件潜在相关的更广大群体中。但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IPVA 的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为横断面的相关研究，因而难以确证前因变量与 IPVA、IPV 之间关系的因果方向，以及这些关系中的潜在调节或中介变量。尽管已经有少量的研究从 IPVA 入手，设计出针对 IPV 的干预项目，以反向验证 IPVA 的作用，如 Fox 等人(2016)设计的"无恐惧亲密关系项目(Relationships without Fear)"，但这些干预项目仍需要坚实的因果实验或随机对照试验的支持，以明确 IPVA 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参见 Lila et al., 2018; Romero-Martínez et al., 2019; Santirso et al., 2020)。

6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将明显受益于一个更广泛和综合性的统一理论，将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从个体、家庭、群体、国家维度，将 IPV 与 IPVA 的影响因素串联起来：不仅探讨个体水平上 IPVA 的影响因素，也要探讨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层面 IPV 流行率与 IPVA 现状的前因变量；不仅探讨不同维度中 IPV 与 IPVA 的危险因素，也要进一步探讨

有利于形成积极的 IPVA 的保护性因素；不仅探讨这些不同因素对于 IPV 与 IPVA 的影响机制，也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出综合性的 IPV 成因理论。

首先，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独有的社会学习经历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水平，对个体层面之外的 IPVA、IPV 影响因素关注较少。例如，在群体层面上，少数研究关注了一些特殊群体的 IPVA，如警察(Serrano-Montilla et al., 2023)、医护人员(Almegewly et al., 2022)以及移民群体(Rodriguez Martinez & Khalil, 2017)的 IPVA，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更多 IPV 相关群体对于 IPV 的态度，以及其中的群体规范与群体特征的作用。而在国家层面上，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与当地的 IPV 流行率和 IPVA 普遍联系(Serrano-Montilla et al., 2020; Tran et al., 2016; Wang, 2019; Willie & Kershaw, 2019)，并且不同国家之间 IPV 流行率与 IPV 态度有着显著差异(Cavalin, 2010; Sardinha & Catalán, 2018; Zark & Satyen, 2022)，但极少数研究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作用机制，比如，是通过国家层面上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响，亦或是 IPV 相关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些都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地探讨。

其次，现有研究都只关注到 IPVA 与 IPV 的危险因素，而较少讨论有助于减少 IPV 与改善 IPVA 的保护性因素，因而难以回答为何同样的社会学习经历和父权制意识形态下，个体间 IPV 态度与行为的变异性(variance)。开展 IPV 与 IPVA 保护性因素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下，个体拥有更多资源对抗 IPV 相关社会学习经历、父权制意识形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形成对 IPV 的正确态度，并且摆脱暴力的代际循环。例如，一些关键他人积极反抗 IPV 的经历。在一些研究中指出，许多经历家暴的女性也可以是勇敢的反抗者和自信的求助者(Rajah & Osborn, 2022; Satyen et al., 2019)，她们在应对家庭暴力这一负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与优秀品质，可能会对目睹家庭暴力的下一代正面影响，从而缓解 IPV 社会学习经历对其 IPVA 的消极影响。例如，Graham-Bermann 等人(2009)发现，在包含 IPV 的家庭中表现出更强大的家庭力量(family strength)、更好的教养方式，以及以往无过往暴力关系经历的母亲，她们的孩子暴露于 IPV 时表现出更多的挣扎与韧性，并且心理适应状况更好。我国研究者也发现了逆境信念对于父母亲密伴侣暴力暴露的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蒲鑫，2022)。因此，未来研究在考察 IPV 与 IPVA 的成因时，需要同时考虑危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后者包含积极的 IPV 预防与反抗经历，以及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

最后，未来研究需要针对性别角色规范的具体内涵，运用情境法，探讨不同维度的预测因素对 IPV、IPVA 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以期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多元交互的 IPV 理论。例如，探讨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产生不同影响的边际条件。在上文中，我们发现善意性别

偏见对 IPVA 时而表现为保护性因素，时而又表现为危险因素，这实际上是因为善意性别偏见属于一种“保护型”的父权结构，通过“善意”的保护性奖励来引导女性限定于某类特定的角色，那么对于违背这类“特定女性角色”的女性，善意性别偏见者是否还会采取“爱护”的态度呢？IPV 受害者表现出的性别角色违反程度或许是影响善意性别偏见对 IPVA 作用的调节因素。已有的部分研究在测量 IPVA 时采用了具体化的情境测量工具，个体会报告 IPV 在不同情境下的可接受/可辩护程度，如伴侣出轨或拒绝性行为时，而这些情境也或多或少反映了父权制传统下对女性角色和责任的刻板印象(如贞洁、顺从)。而相应的，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 IPV 态度也有所不同。如根据 Waltermaurer(2012)的总结，大多数人都认为 IPV 合理的情境是，当女性疏于照顾孩子(5%-64%)或未经允许外出(10%-83%)时，而较少因为食物准备问题(0.2%-60%)为 IPV 辩护。而 IPVA 在这些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情境中女性违反其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所决定的。未来的研究可以操纵不同情境下个体认定受害者违反其性别角色的程度，探究其与善意性别偏见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对 IPVA 的影响，检验是否当假定的 IPV 受害者违反其性别角色的程度低时，善意性别偏见负向预测个体为 IPV 的辩护水平，而当假定的 IPV 受害者违反其性别角色的程度高，善意性别偏见就正向预测个体的 IPV 辩护水平。通过操纵受害者违背性别角色规范程度这类调节变量，我们能更进一步地把握的善意性别偏见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它们与 IPVA 之间的联系。

总之，“亲密伴侣暴力态度”的提出，是对传统亲密伴侣暴力领域的拓展革新。它作为 IPV 的影响路径中的近端因素，构建起前因变量与 IPV 的因果关系，脱离 IPV 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框架，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探讨 IPV 的成因——即以讨论 IPVA 成因的间接方式。本文聚焦于 IPVA 在社会学习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成因研究，总结了社会学习经历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 IPVA 的影响机制，梳理了“IPV 相关社会学习经历-IPV 态度-IPV 行为”和“父权制意识形态-IPV 态度-IPV 行为”两条因果路径。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这两种解释进行理论构架的综合，建立起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IPVA 预测模型，以更深入地探讨 IPV 态度的生成机制与社会根源。

参考文献：

陈志霞 & 陈剑峰. (2007). 善意和敌意性别偏见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5*(03), 464-469.

崔轶, 洪炜, 苏英 & 刘晓柳. (2012). 七省市家庭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报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3), 360-362+327.

蒲鑫. (2022). 父母亲密伴侣暴力暴露与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和逆境信念的调节作用. 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杨淳惠, 刘婉兰, 王怡欢, 胥爽, 徐羽茜, 杨璐嘉, 周琦 & 李俊一. (2021, Oct). *矛盾性别歧视对亲密伴侣暴力容忍度和实施的影响：关系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下）(pp.267-268). 中国, 内蒙古呼和浩特.

张珊珊, 谢晋宇 & 吴敏.(2019). "蜜糖裹砒霜": 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生涯发展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7*(8), 1478-1488.

Aboagye RG, Okyere J, Seidu A-A, Hagan JE Jr., Ahinkorah BO. (2021). Experi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Women in Sexual Unions: Is Supportive Attitude of Women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Correlate? *Healthcare, 9*(5):563.

Aboagye, R. G., Seidu, A. A., Asare, B. Y. A., Peprah, P., Addo, I. Y., & Ahinkorah, B. O. (2021). Exposure to interparental violence and justific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women in sexual un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 *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 *79*, 1-11.

Almegewly, W. H., Hawamdah, S., Moussa, F. L., Dator, W. L. T., Alonezi, A., & Al-Eissa, M. (2022). Measuring Nurses' and Physicians'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audi Arabia. *Healthcare*, *10*(8), 1430.

Alvarez, C., Lameiras-Fernandez, M., Holliday, C. N., Sabri, B., & Campbell, J. (2021). Latina and Caribbean Immigrant Women's Experiences with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tory of Ambivalent Sexism.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7–8), 3831–3854.

Antle, B., Karam, E. A., Barbee, A. P., Sullivan, D., Minogue, A., & Glover, A. (202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ttitudes: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5*(1), 1-21.

Badenes-Sastre, M., Lorente, M., & Expósito, F. (2023). Future health-professionals: Attitudes, perceived severity,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ses.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Psicología y Salud, 14*(1), 10-17.

Bandura, A.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Begum, S., Battala, M., Chalmiers, M. A., Prusty, R. K., Dixit, A., Johns, N. E., ... & Raj, A. (2023). Spousal Concordance in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hysical IPV Against Wom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Young Married Couples in Rural India. *Partner Abuse*.

Bell, K. M., & Naugle, A. E. (200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oving towards a contextual framework.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7), 1096-1107.

Benson, P. L., Scales, P. C., Hamilton, S. F., & Sesma, A., Jr. (2006).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R. M. Lerner & W. Dam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pp. 894–941). John Wiley & Sons Inc.

Berkowitz, A. D., Bogen, K. W., Lopez, R. J. M., Mulla, M. M., & Orchowski, L. M. (2022). The social norms approach as a strategy to prevent violence perpetrated by men and boy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ngaging boys and men in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149-181.

Cano-Gonzalez, I., Charak, R., Gilbar, O., Viñas-Racionero, R., & Strait, M. K. (2022). Witnessing Parental Violence and Cyber IPV Perpetration in Hispanic Emerging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itudes Toward IPV.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9-10), NP8115-NP8137.

Canto, J. M., Vallejo-Martín, M., Perles, F., & San Martín, J. (2020).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denial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role of sexism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in the Spanish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4), 4934.

Clare, C. A., Velasquez, G., Martorell, G. M. M., Fernandez, D., Dinh, J., & Montague, A. (2021). Risk factors for male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56*, 101532.

Cinquegrana, V., Marini, M., & Galdi, S. (2022). From endorsement of ambivalent sexism to psychological IPV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attitudes supportive of IPV, legitimating myths of IPV, and acceptance of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22814.

Copp, J. E., Giordano, P. C., Longmore, M. A., & Manning, W. D.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 examination of key correlates among a sample o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7), 1357–1387.

DeKeseredy, W. S., & Dragiewicz, M. (2007).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ies of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man abuse: A commentary on Donald G. Dutton's Rethinking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8), 874–884.

Devries, K. M., Mak, J. Y., Garcia-Moreno, C., Petzold, M., Child, J. C., Falder, G., ... & Watts, C. H. (2013).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cience*, *340*(6140), 1527-1528.

Dixon, L., & Graham-Kevan, N. (2011).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etiolog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7), 1145-1155.

Dobash, R. P., & Dobash, R. E. (1979). *Violence against wives: A case against the patriarch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Eagly, A. H., & Chrvala, C.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conformity: Status and gender role interpretat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0*(3), 203-220.

Eriksson, L., & Mazerolle, P. (2015). A cycle of violence? Examining family-of-origin violence, attitud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0*(6), 945-964.

Franklin, C. A., Goodson, A., & Garza, A. D. (201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sexual minorities: Predicting police officer arrest decis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6*(8), 1181-1199.

Fanslow, J. L., Mellar, B. M., Gulliver, P. J., & McIntosh, T. K. (2023). Evidence of gender asymmetry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xperience at the population-level.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8*(15-16), 9159-9188.

Fox, C. L., Corr, M. L., Gadd, D., & Sim, J. (2016).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omestic abuse prevention education: Are certain children more or less receptive to the messages conveyed?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1*(1), 212–227.

Glick, P., & Fiske, S. T. (2001).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2), 109-118.

Glick, P., & Fiske, S. T. (2018). The 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Differentiating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In *Social cognition* (pp. 116-160). Routledge.

Goessmann, K., Ibrahim, H., Saupe, L. B., Ismail, A. A., & Neuner, F. (2019). The contribu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gender attitudes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war and displacement: Evidence from a multi-informant couple survey in Iraq.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37*, 112457.

Gracia, E. (2022).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Maggino, F. (eds)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pp. 1-5). Springer, Cham.

Garcia, M. (2021). *We are not born submissive: How patriarchy shapes women's liv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acia, E., Lila, M., & Santirso, F. A. (2020).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Psychologist, 25*(2), 104-121.

Gracia, E., Rodriguez, C. M., & Lila, M. (2015).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an analog procedure to assess acceptabilit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partner violence acceptability movie task.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567.

Graham-Bermann, S. A., Gruber, G., Howell, K. H., & Girz, L. (2009). Factors discriminating among profiles of resilience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expos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Child abuse & neglect, 33*(9), 648-660.

Grembi, V., Rosso, A. C., & Barili, E. (2024). Domestic violence perception and gender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7*(1), 1-32.

Han, Y. R., & Choi, H. Y. (2021). Risk factors affect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ccurrence in South Korea: Findings from the 2016 Domestic Violence Survey. *Plos one*, *16*(3), e024791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47916

Hardesty, J. L., & Ogolsky, B. G. (2020). A soc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search: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1), 454-477.

Herzog, S. (2007). An empirical test of feminist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gender-role attitudes on percep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eminist Criminology, 2*(3), 223-244.

Johnson, I. M., & Sigler, R. T. (2018).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Routledge.

Juarros Basterretxea, J., Overall, N., Herrero Olaizola, J. B., & Rodríguez Díaz, F. J. (2019).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sexism on psycholog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tudy with imprisoned me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plied to Legal Context, 11*(2), 61-69.

Kishor, S., & Johnson, K. (2004). *Profiling domestic violence: A multi-country study*. MEASURE DHS+, ORC Macro, Calverton.

Koepke, S., Eyssel, F., & Bohner, G. (2014). "She Deserved It": Effects of Sexism Norms, Type of Violence, and Victim's Pre-Assault Behavior on Blame Attributions Toward Female Victims and Approval of the Aggressor's Behavi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4), 446–464.

Kruahiran, P., Boonyasiriwat, W., & Maneesri, K. (2022). Thai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victim blaming: The influence of sexism and female gender rol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9-10), NP7426-NP7446.

Lelaurain, S., Fonte, D., Giger, J. C., Guignard, S., & Lo Monaco, G. (2021). Legitimiz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role of romantic lov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triarchal ideologi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3-14), 6351-6368.

Li, L., Sun, I. Y., & Button, D. M. (2020). Tolerance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21-22), 4533-4557.

Li, S., Zhao, F., & Yu, G. (2020). A meta-analysi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50*, 101362.

Lila, M., Gracia, E., & Catalá-Miñana, A. (2018). Individualized motivational plans in 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6*(4), 309–320.

Lipps, A. J. (2002). *Attachment,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model proposed to expla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s that abuse intimate partners and those that abuse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Machado, C., Caridade, S., & Martins, C. (2010). Violence in juvenile dating relationships self-reported prevalence and attitudes in a Portuguese sampl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5*, 43–52.

Machado, C., Gonçalves, M. M., & Matos, M. (2007). *Marital Violence Inventory (IVC) and Attitudes Toward Marital Violence Scale (ECVC) manual*. Braga, Portugal: Psiquilíbrios Edições.

Martín-Fernández, M., Gracia, E., & Lila, M. (2022). Measuring perceived severit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PVAW)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IPVAW offenders.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31*(2), 109.

Martín-Fernández, M., Gracia, E., Marco, M., Vargas, V., Santirso, F. A., & Lila, M. (2018). Measuring acceptabilit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IPVAW scal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plied to Legal Context*, *10*(1), 26-34.

Mihalic, S. W., & Elliott, D. (1997).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model of marital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2*, 21−46.

Mulla, M. M., Witte, T. H., Richardson, K., Hart, W., Kassing, F. L., Coffey, C. A., ... & Sherwood, I. M. (2019). The causal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ocial norms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converging cross-sectional, longitudinal, and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a social disinhibition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4), 652-668.

Phillips, B., & Phillips, D. A. (2010). Learning from youth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Decentering DV and the primacy of gender stereotyp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3), 291-312.

Pöllänen, K., de Vries, H., Mathews, C., Schneider, F., & de Vries, P. J. (2021). Beliefs About Sexu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3-4), NP2056-2078NP.

Powell, A., & Webster, K. (2018). Cultures of gendered violenc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sures of attitudinal support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1*(1), 40-57.

Priestley, S., & Lee, K. A. (2021). Understanding IPV perpetration among young Jamaican men: The role of socialization and attitudinal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7-18), NP9053-NP9077.

Rajah, V., & Osborn, M. (2022). Understanding women's resistance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coping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5), 1373-1387.

Rani, M., Bonu, S., & Diop-Sidibe, N. (2004).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ife-beating among men and women in seve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frican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health, 8*(3), 116-136.

Rodriguez Martinez, P., & Khalil, H. (2017). Changing values: attitudes abou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immigrants and natives in five Western countries. *Deviant behavior*, *38*(3), 241-253.

Romero-Martínez, Á., Lila, M., Gracia, E., & Moya-Albiol, L. (2019). Improving empathy with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mes: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2), 125-139.

Ross, J., Deardorff, J., McKool, M., Harley, K. G., Nguyen, A. M., & Marceau, K. (2022). The association of adolescent gender performance and ad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71*(6), 705-712.

Santirso, F. A., Gilchrist, G., Lila, M., and Gracia, E. (2020).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Intervention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ffen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29*(3), 175 - 190.

Sardinha, L., & Catalán, H. E. N. (2018). Attitudes towards domestic violence in 49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gendered analysis of prevalence and country-level correlates. *PloS one, 13*(10), e020610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6101

Satyen, L., Rogic, A. C., & Supol, M. (201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help-seeking behaviou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21*, 879-892.

Saunders, D. G., Lynch, A. B., Grayson, M., & Linz, D. (1987). The inventory of beliefs about wife bea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beliefs and attitudes. *Violence and Victims, 2*(1), 39-57.

Schuster, I., Gul, P., Eisner, M., & Ghuneim, L. (2021). Attitudes toward wife beating among female and male adolescents in Jorda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23-24), NP12922-NP12948.

Schuster, I., & Tomaszewska, P. (2021). Pathways from child sexual and physical abuse to sexual and phys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through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6*, 443-453.

Semahegn, A., Torpey, K., Manu, A., Assefa, N., Tesfaye, G., & Ankomah, A. (2019). Are interventions focused on gender-norm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low and lower-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Reproductive health*, *16*, 1-31.

Serrano-Montilla, C., Lozano, L. M., Alonso-Ferres, M., Valor-Segura, I., & Padilla, J. L. (2023). Understanding the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of police attitudes toward intervention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4*(1), 245-260.

Serrano-Montilla, C., Lozano, L. M., Bender, M., & Padilla, J. L. (2020).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risk factors of attitudes justify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multilevel cross-sectional study. *BMJ open*, *10*(12), e037993. https://doi:10.1136/bmjopen-2020-037993

Shakya, H. B., Cislaghi, B., Fleming, P., Levtov, R. G., Boyce, S. C., Raj, A., & Silverman, J. G. (2022). Associations of attitudes and social norms with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married adolescents and their husbands in rural Niger: a dyadic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women's health*, *22*(1), 180.

Shakya, H. B., Fleming, P., Saggurti, N., Donta, B., Silverman, J., & Raj, A. (2017).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itudes and perpetration: Dyadic couples data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rural Indi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79*, 97-105.

Shorey, R. C., Fite, P. J., Torres, E. D., Stuart, G. L., & Temple, J. R. (2019).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cceptability of violenc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Psychology of Violence, 9*(1), 108–116.

Sikweyiya, Y., Addo-Lartey, A. A., Alangea, D. O., Dako-Gyeke, P., Chirwa, E. D., Coker-Appiah, D., ... & Jewkes, R. (2020). Patriarchy and gender-inequitable attitudes as drive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Ghana. *BMC public health*, *20*, 1-11.

Speizer, I. S. (2010).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 among women and men in Uganda.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5*(7), 1224–1241.

Stith, S. M., Rosen, K. H., Middleton, K. A., Busch, A. L., Lundeberg, K., & Carlton, R. P. (2000).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pouse abuse: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3), 640-654.

Sunmola, A. M., Mayungbo, O. A., Ashefor, G. A., & Morakinyo, L. A. (2020). Does relation between women's justification of wife beat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iffer in context of husband's controlling attitudes in Nigeri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1), 85-108.

Tang, C. S., & Lai, B. P. (2008). A review of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markers of male-on-fe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7-2006.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3*(1), 10-28.

Tiruye, T. Y., Harris, M. L., Chojenta, C., Holliday, E., & Loxton, D. (2020). Determinan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Ethiopia: A multi-level analysis. *PLoS one, 15*(4), e023221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2217

Tran, T. D., Nguyen, H., & Fisher, J. (2016). Attitudes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mong Women and Men in 39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PLOS ONE, 11*(11), e0167438.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7438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6). Technical Note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Huma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 New York. Retrieved from: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2016humandevelopmentreportpdf1pdf.pdf.

Uthman, O. A., Lawoko, S., & Moradi, T. (2009).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 sub-Saharan countries.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9*(1), 1-15.

Valor-Segura, I., Expósito, F., Moya, M., & López, K. (201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pain and Cuba: The same reality, two different visions/Violencia hacia la mujer en España y Cuba: una misma realidad, dos visiones diferentes.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29*(1), 150-179.

Vives-Cases, C., La Parra-Casado, D., Gil-González, D., & Caballero, P. (2021). Acceptability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mong the Roma population in Spai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1-12), 5795-5812.

Waltermaurer, E. (2012). Public justific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3*(3), 167-175.

Wang, L. (2019). Education, perception factors, and preven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concern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8), 1611-1632.

Willie, T. C., & Kershaw, T. S. (2019). 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Medicine, 118*, 257–26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stimation and Data (UNICEF, UNFPA, UNODC, UNSD, UN Women) (2021).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alence estimates 2018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lobal and reg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2256

Yakubovich, A. R., Heron, J., Feder, G., Fraser, A., & Humphreys, D. K. (2019).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sation in early adulth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new measur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BMJ open*, *9*(3), e025621.

Yang, M., Beybutyan, A., Ríos, R. P., & Soria-Verde, M. Á. (2021).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hina and Spain. *Anuario de Psicología Jurídica*, *31*(1), 101-108.

Yang, T., Poon, A. W. C., & Breckenridge, J. (2019).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mainland China–insight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4*, 93-105.

Yoshihama, M., Blazevski, J., & Bybee, D. (2020). Gender (a) symmetry in correlates of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Gender (a) symmetry in IPV and the role of gender attitud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6*(9), 1033-1054.

Zapata-Calvente, A. L., Megías, J. L., Moya, M., & Schoebi, D. (2019). Gender-related ideological and structural macr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European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3*(3), 317-334.

Zark, L., & Satyen, L. (2022).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3), 1007–1022.

The Caus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itude-Based Expla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Learning and Feminist Theory

TU Hua, ZHANG Chunm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cademy of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s attitudes towa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one's IPV related behaviour, which will be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perpetrator or victim, but also in the willingness and response of third parties to intervene. By introducing attitudes into the field of IPV, we were able to convert the question of the causes of IPV into a question of the causes of IPV attitudes, breaking through the original research limi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feminist theory, IPV attitudes connect two explanatory paths: IPV-related social learning experiences/patriarchal ideology – IPV Attitudes - IPV.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nefit from combining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 social learning theory's emphasis on causal processes and feminist theory's emphasis on causal roots - to incorporate both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group level, and to develop a multivariate interacting explanatory model of IPV attitudes.

Key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itude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feminist theory